

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

张 云 曾现江

[摘要]藏文史籍中存在着两类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一类是吐蕃历史的唐蕃关系部分有关中原的记载,另一类则是由专门篇章所记载的中原历史,并可细分为“中原王统世系”和“中原教法源流”两部分。这些记载以其独特的方式折射出藏族史家从其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及立场出发,阐发他们对中原地区及中原历史的态度与观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藏文史籍; 中原;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 05—0001—05

基金项目: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文史籍中有关中原史实的记载及相关内涵研究”(10JJD850002)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云(1960—),男,陕西周至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 藏族历史。北京 100101 曾现江(1970—),男,重庆忠县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史。重庆 400715

自公元 7 世纪藏文创制以来,藏文史籍就成为记录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藏族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主要传承纽带。无论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还是后弘期的各种教法史、史册、王统世系等,都有不少关于中原地区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研究者多以其“史料价值”不高而不予重视,或仅局限于对其中个别史实记载“真伪”的甄别上,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知识系统,置于藏汉关系和藏汉文明交流的历史场域中加以审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这些记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也认识不足。

一、吐蕃时期藏文史料有关中原的内容

吐蕃时期遗留至今的藏文文献包括古藏文手卷写本、简牍和金石铭刻等三大类。其中,吐蕃简牍由于大部分出自下级军官、军士和基层官员之手,内容主要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基本上没有与中原相关的内容。在古藏文写卷和金石铭刻这两类文献中,与中原(唐朝)相关的内容也不多见,除一些译自汉文文献的写卷外,还没有发现有专门或独立记载中原的内容。

古藏文写卷有关中原的记载,首推《敦煌本吐

蕃历史文书》^[1],其中又以 P. T. 1288《大事纪年》所载内容最为丰富。该写卷类似汉文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叙事清晰,笔法简洁,简明扼要地逐年记录吐蕃从藏历狗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 650 年)到藏历龙年(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共 115 年间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涵盖了和亲、唐使入蕃、战争、盟会及边境地方官员交涉等多方面。一是唐蕃和亲,对包括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两位唐朝公主先后入藏以及两位公主的薨逝都有简明记载。二是唐朝使节入蕃,从藏历猪年(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到藏历虎年(代宗宝应三年,公元 762 年)共计 63 年间,唐朝入蕃使节 17 人次与吐蕃赞普或执政者相见于赞普牙帐。三是战争,包括双方在青海、河陇和西域等地区十次大小不等的战争或边境冲突,以及“安史之乱”期间吐蕃攻占长安,扶持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承宏为帝之事,而且对此事件的记载还颇为详细。至于唐蕃双方边境地方官员交涉方面的内容则只有一例。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二部分 P. T. 1287《赞普传记》类似汉文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记载了七位赞普及其大臣的文治武功,举凡征战、会盟、联姻、交往等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神话和歌谣等都有记录。《赞普传记》共有十节,其

中有三节与唐朝有关。一是墀德祖赞时期,吐蕃攻战唐朝瓜州以西各地,以及吐蕃在剑南地区所获得的重大进展,即南诏背唐投蕃事件。二是墀松德赞时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攻战,包括吐蕃军攻陷长安、立广武王为帝,韦·结桑达囊率军击败唐朝浑瑊,以及韦·赞热咄咄攻占陇山山脉以西各地、设立五道节度使等。三是唐朝大将王孝杰与吐蕃噶尔·钦陵的辩答与交战之情。

P. T. 960《于阗教法史》也是一份著名的古藏文写卷,可以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于阗授记》相互印证。虽然该写卷的主要内容是于阗佛教史,但仍有部分内容涉及中原。一是于阗建国传说:于阗最初的国王名地乳者乃阿育王之子,被汉地国王收为养子,后带领许多汉兵和随从来到于阗,与一位被阿育王放逐的大臣所带的来自印度士兵和随从相遇,共同建立了于阗城。二是提到了唐蕃君主结成“甥舅”关系,并记载文成公主入嫁吐蕃赞普后,修建寺庙,供养佛教,最后死于黑痘之症,又称汉王、吐蕃王、回鹘王等三大国王与印度的卓背萨达王鏖战十二年。^{[2] [P. 147-158]}

另外, P. T. 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主要记载了回鹘北方的若干族群——如突厥、契丹、奚、高丽等,其中也略有涉及中原之处。^{[2] [P. 159-173]}残卷《吐谷浑纪年》(编号为 Vol. 69, Fol. 84)也有关于唐朝公主 Mun - cheng 入蕃和亲事件的记载,但其中的 Mun - cheng 究竟是文成公主还是金城公主,成为关于这份藏文残卷争议的焦点。^{[3] [P. 7-10]} P. T. 16 和 IOL TIB J 7511 是一组涉及赤祖德赞的祈愿文,系吐蕃的地方官员、属民、部落等为庆祝吐蕃与唐、回鹘会盟成功而修建的寺庙落成时所作,涉及到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与会盟。^[4]

目前发现的古藏文写卷中,有不少是汉文典籍的翻译,其中一些译自汉文史籍,内容自然是中原历史。P. T. 986 是《尚书》的译文,共有四节,包括《泰誓》两篇、《牧誓》一篇、《武成》一篇,均属于《周书》的范围。^{[2] [P. 69-79]} P. T. 1291 是《战国策》的译文,包括《魏策》六篇,分别是《田需贵于魏王》(《魏策二》)、《华军之战》(《魏策三》)、《秦魏为与国》(《魏策四》)、《王假三年》(《史记·魏世家十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魏策四》)和《魏攻管而不下》(《魏策四》)。^{[2] [P. 85-94]}也有研究者认为,该写卷并非《战国策·魏策》译文,而是《春秋后语》中《魏语》的译文。^[5]

保留至今的吐蕃金石碑铭有十余件,其中只有三件涉及到唐朝,分别是《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和《赤德松赞墓碑》。^[6]《唐蕃会盟碑》为唐蕃长庆会盟时所刻,其内容主要是追述唐蕃双方的历史及双方的交往历史,强调唐蕃因和亲而结成的舅甥情谊,约定双方的边界划分。《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立于赤松德赞时期,涉及到吐蕃大臣达札路恭率军攻唐,深入长安,并立广武王为帝一事。《赤德松赞墓碑》则简略追述了赤德松赞即位之初率军攻唐,以及后来唐蕃双方订立盟约的史实。

总体来看,吐蕃古藏文文献有关中原史实的记载并不多。无论是古藏文写卷还是金石文献,除了 P. T. 986 和 P. T. 1291 等译自《尚书》、《战国策》等汉文史籍的卷子外,迄今还没有发现独立或专门以中原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在记载有关吐蕃对外关系时才涉及到一些中原地区(唐朝)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唐蕃关系来说,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不过,其中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毕竟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很难凭借这些材料来了解吐蕃究竟是如何认识、理解中原唐朝的,也难以判断一个比较清晰的中原观念在吐蕃社会是否已经形成,更遑论讨论其内涵等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几乎所有涉及周边四邻和吐蕃对外交往的古藏文材料中,唐朝都被置于首要位置,吐蕃对唐朝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同样与吐蕃在战争、联姻、会盟等多方面都发生密切关系的突厥、回鹘、南诏等周边政权。视唐朝为大国、上国,以能够与唐朝发展关系而感到自豪,这样的观念在吐蕃藏文史料中得到了相当明显的反映。

二、后弘期藏文史籍关于中原的记载

公元 842 年,下令灭佛的达磨赞普遇刺而亡,吐蕃王朝随之分崩离析,吐蕃地区进入一个长期战乱的动荡时代。在达磨赞普灭佛的过程中,吐蕃的文化典籍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即使是在灭佛过程中幸免于难的部分典籍也多在吐蕃社会的长期战乱和动荡中湮没和散佚。到 10 世纪后半叶,战争逐渐减少,社会渐趋安定,佛教重新传播并迅速发展,藏文历史编纂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有关中原的记载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一) 后弘期早期的伏藏文献中有关中原的记载

随着佛教的复苏,到 12-13 世纪,一些佛教

徒相继声称发掘出了一批吐蕃时期埋藏于地下或建筑物中的佛教文献,即伏藏。这些伪托为莲花生大师或吐蕃名王将相所传的伏藏,虽然有许多妄诞无稽或穿凿附会的神话传说,但仍不失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不管从内容、结构,还是叙事方式、文字风格来看,都比吐蕃时期的文献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后弘期早期的伏藏作品中,《拔协》和《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等书都有较多内容涉及中原,当然两书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仍限于唐蕃关系。《拔协》被誉为后弘期的第一部藏文史书,其中有关中原的记载集中在唐蕃和亲、甥舅会盟及唐蕃佛教关系等方面。在唐蕃和亲方面,虽有部分内容涉及文成公主,但主要是围绕金城公主展开的,并且出现了赤松德赞系金城公主所生及其在一周岁时认出汉人舅舅的故事。在唐蕃佛教关系方面,《拔协》称中原(唐朝)佛法兴盛,是吐蕃佛法的主要源泉。该书不但讲述了文成公主供奉释迦牟尼佛像、金城公主将中原佛法的“七日祭”引入吐蕃等内容,而且详细记载了汉人使臣之子桑喜劝导吐蕃赞普倡行佛法、吐蕃两次派使臣到中原求取佛经并随汉地“和尚”学习佛法,以及吐蕃在佛教兴起过程中,汉地“和尚”的各种贡献等内容。^{[7] (P. 2-22)}《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以铺陈、夸张的手法叙述了一系列唐蕃和亲和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突出了大量中原物品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妆进入吐蕃的盛况,包括法规律令、诗文曲赋、农牧生产技术、天文历算、卜筮风水、房屋建造技术、医学知识等在内的各种中原文化随之传入吐蕃,而最为重要的则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僧人比丘和佛经等随文成公主进入吐蕃。^[8]

(二) 元明时期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

元、明两代是藏族史学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元王朝对西藏地区的统一管理,不但为各西藏教派之间的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极大地推动了藏区与中原地区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包括历史编纂学在内的藏族文化的发展。从元代中后期到明代前期,相继出现了《佛教史大宝藏论》、《红史》、《朗氏家族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等一大批优秀的藏文历史著作,形成了教法史、史册、王统记、世系史等各种类型的史学体裁。这些史籍都沿袭《拔协》、《柱间史》等早期伏藏作品对唐蕃关系史的记载,并且在内容上

更加全面、故事情节上更加丰富。尤其是元代后期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在《西藏王统记》中,将早期伏藏作品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记载与民间传闻及佛经故事相结合,将一系列极富文学色彩和宗教色彩的故事缀联在一起,成为元明时期藏文史籍记载这段历史的主要参照对象。

就对中原史实的记载而言,元明时期的藏文史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在沿袭早期伏藏作品有关唐蕃关系史记载的同时,还用专门的篇章来讲述中原王朝的历史。这个变化最早出现在《红史》中,该书由曾长期担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的蔡巴万户的万户长贡嘎多吉撰写于元代后期。在书中,作者以周昭王二十年为起点,叙述历代中原王朝的更迭、帝王世系及在位年数,并在东汉至唐代前期部分插入一些佛教故事。在唐朝部分,又将帝王世系及帝王在位年代与《唐书·吐蕃传》所载的唐蕃关系史有机结合起来,以唐蕃之间的和亲、战争与会盟等内容为重点。接着简略记载了五代和两宋的帝王世系,以及西夏国王如何取代汉地国王的故事及其世系。最后是对蒙古及元朝王统的记载:始于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贴赤那,止于顺帝妥欢贴睦尔。^{[9] (P. 11-15)}由此,《红史》就构建出了一个自成体系且相对完整的“中原王统世系”——以帝王世系为纲的中原王朝历史。这样的中原王朝历史总的来说非常简略,但具体到各个朝代则是详略有异。首先,作者以周昭王二十年作为叙述起点,没有汉文史籍惯常所载的“三皇”、“五帝”及夏、商两代。其次,唐以前各朝的历史非常简省,只提到部分中原政权的王位传承代数 and 个别帝王的名字,其中魏晋南北朝部分不但简略,而且颇为含混,遗漏甚多,只提到了十六国中的前秦和后秦、后凉,而更为重要的北朝和南朝都未见记载。相对而言,唐朝历史就全面和准确得多,如帝王世系只遗漏了穆宗与文宗之间在位仅两年的唐敬宗,而且皇帝的即位时间和在位时间也与汉文史籍的记载相同或大体相近。帝王世系基本上完整的还有元朝,而五代和宋辽金西夏各朝的帝王世系则较为简略。

通过穿插一些佛教故事,《红史》实际上还构建了一部简略的中原佛教史。作者先是在“印度王统”的结尾处讨论释迦牟尼灭寂年代时,指出释迦牟尼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年,并记载了著名的旃檀佛像的建造和释迦牟尼对此像在一千年后将至汉地的预言;在后面的中原王统世系部分,作者先

后记载了汉明帝时法竺竺等人白马驮经至洛阳、前秦遣人从西域迎请觉卧佛像、佛舍利及僧人鸠摩罗什,并铺陈记载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种种神异故事;在隋唐历史部分,则分别讲述玄奘取经和道宣律师奇遇多闻天王之子的神异事迹,然后称觉卧佛像被文成公主带入吐蕃。这个融于中原王朝历史叙述之中的中原佛教史,其实还隐藏着一个觉卧佛像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原,再到吐蕃的迁移史。

《红史》成书后,用专门的篇章来记载中原王朝历史就成为许多藏文史籍的惯例。许多编纂于明代的藏文史籍,如《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都沿袭了《红史》“中原王统世系”的写作范式,记载了一部结构和内容都基本相同的中原王原历史,其中成书较晚的如《汉藏史集》、《青史》、《新红史》等,则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一些元、明两朝的史实。

(三) 清代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

清代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以松巴堪布·意希班觉所著《如意宝树史》和土观·罗桑却吉尼玛所著《土观宗派源流》这两本教法史最值得关注。

《如意宝树史》第三章名为“摩诃支那大汉地法王、佛教大师、佛法宗派之历史”,但在结构上分为“王统世系”和“教法源流”两部分。在“王统世系”部分,作者先介绍汉地的地理范围及其特征,然后记载了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清乾隆时期的中原王朝历史。在“教法源流”部分,作者首先总述中原各种教派的源流,指出中原主要有儒、释、道三教,以及墨子、列子、庄子等人的“教法”和一些外来的宗教;然后述叙中原佛教史,并将中原佛法分为律宗、密宗、广行宗、深观宗和心要宗(禅宗)五派,分别阐述各派的传承和特点。另外,该书在第二章“藏地佛教史”的记叙中,沿袭了常见于元明时期藏文史籍的唐蕃关系史内容。^[10] (P. 740-764)

《土观宗派源流》对中原的记载集中于“汉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教派源流”部分,主要内容是儒、道、释三教的源流和基本教义,以及伊斯兰教传入中原后的发展情况。在儒家学说源流部分,作者称儒起源于伏羲,而孔子则是儒学的创始人,他的基本思想反映在“四书”之中;又介绍从儒学生发出来的学问,包括历算、阴阳、八卦、医学、歌

舞、历史著作、工艺技艺、堪舆之学、相人之术、占卜推算等;接着介绍儒家的基本理论、主要典籍以及修习进程等内容。道教源流部分相对简略,作者从道教始祖老子讲起,然后分析道教的教义和修习方法。对于汉地佛教源流,作者分“由天竺传入”和“由藏地传入”两部分进行记载。“天竺传入”部分以释迦牟尼诞生的周昭王二十年为起点,记载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后的发展历史,然后将中原佛教分为律宗、密宗、广行宗、深观宗、心要宗等五派,作进一步的介绍。在“由藏地传入”部分,主要讲述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在中原的活动情况。^[11] (P. 193-216)

较之元明时期的藏文史籍,《如意宝树史》和《土观宗派源流》两书有关中原的记载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全面,这尤其体现在两书对中原宗教文化的记载上。值得注意的是,两书作者对以往藏文史籍中流行的一些对中原的误解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例如《拔协》所记载的吐蕃僧诤故事,将有关顿、渐之争的讨论演绎成汉地和尚摩诃衍与莲花戒之间的直接争执,而后世许多藏文史籍不但沿袭其说,并将摩诃衍所传之法称为和尚之教,多有贬损,乃至视为邪说异端,对中原佛教史的记载因此也多止于唐朝前期。然而《如意宝树史》与《土观宗派源流》两书不但对汉地佛法从传入直到清代的发展史详加记载,而且对历代中原高僧的贡献大加赞颂,并明确指出虽然大乘和尚即摩诃衍在认识上有不正确之处,但“不可只就一和尚所言有误,便认为一切和尚之见皆是邪计。”^[11] (P. 214)

三、藏文史籍有关中原记载的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是吐蕃古藏文文献,还是后弘期藏文史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关中原的记载。这些记载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吐蕃历史的唐蕃关系部分有关中原的记载,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有关中原的记载多属此类,而这类记载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后弘期藏文史籍中;另一类是由专门篇章所记载的中原历史,可细分为中原王统世系和中原教法源流两个基本部分,这类记载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系由撰写于元代后期的《红史》开创并为后世许多藏文史籍所继承,并在内容上不断补充。

以上两类有关中原的记载,在藏文史籍中或详或简,虽然都难免将史实杂糅于宗教神话与民间传说之中,失实之处颇多,不少内容模糊不清,不乏虚构与想象的成份,甚至不同史籍之间还存

在抄袭、雷同等问题,但是这些记载却以其独特的方式折射出藏族史家从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等立场出发,阐发了他们对中原地区及中原历史、文化的态度与观点,其内容既包含了古代藏族的中原观,也从观念层面深刻地反映了古代藏汉民族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因此,对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进行系统地、全面地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梳理藏族中原观的形成与演变历史,分析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古代藏汉民族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价值:

首先是对认识与理解汉藏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藏文史籍有关中原史实的记载及其相关内涵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印证汉藏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交流与互动,而且可以从政治、宗教及文化认同等角度,理解古代藏族知识精英的历史情感与立场,从思想观念层面反思与研究历史上的汉藏关系。

其次是有助于深化汉藏关系史、中原历史及相关史实的研究。藏文史籍对中原史实的记载虽然简略,且舛误颇多,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汉藏关系史及中原地区历史相关史实的澄清、补充和纠谬作用,从而完善对汉藏关系历史面貌的认识与理解。

第三是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藏族古代史学写作的某些基本特点与规律,从而推动藏族史学史、藏族文化史的深入研究。藏文历史编纂学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史实的记载是古代藏文史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记载在写作选材、体例、编纂原则上都有其自身的丰富内涵。通过

对汉藏文相关史实及不同藏文史籍记载的对比与分析,不仅可反映出藏族史家对中原历史的认识程度,及其对中原史学写作方法的借用和藏文史籍写作的演变过程,还可从中总结归纳出藏文史籍的基本书写范式、史家的写作理念及其所受到的宗教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王尧,陈践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 [2]敦煌吐蕃文书选[M].王尧,陈践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 [3][英]F. W. 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刘忠,杨铭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4]王维强.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发愿文为中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8-22; F. W. 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刘忠,杨铭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80-86.
- [5]马明达. P. T. 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J].敦煌学辑刊,1984(2).
- [6]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7]拔·塞囊.拔协[M].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 [8]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M].卢亚军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
- [9]蔡巴·贡噶多吉,东嘎·洛桑赤列校注.红史[M].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 [10]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如意宝树史[M].蒲文成,才让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 [11]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综派源流[M].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收稿日期:2011-03-12 责任编辑 李克建